

## 《日本人的侵略与返迁体验》中情与理的交错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蔺 静

**[摘要]** 1971年8月,日本综合性杂志《潮》推出了一期题为“日本人的侵略与返迁体验”特辑。这本特辑是日本学术界、思想界关于战后日本普通民众返迁归国问题的一次集中性讨论,其中收录了竹内好、鹤见俊辅等战后日本思想精英的相关讨论,以及在《返迁者百人告白》中呈现出的民众声音。笔者通过对《返迁者百人告白》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其中充斥着强烈且单方面的受害情绪,而此种受害叙事亦是日本知识界自战败以来,以日本人的返迁经历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的基调延续。本研究通过剖析思想家将“情理纠葛”的悲情“哀史”原理化、方法化的学理思考,探究返迁体验中加害意识与受害意识的错位、东亚近代化的缺陷等问题。

**[关键词]** 战争 返迁 哀史 加害 受害

### 引 言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居住于原日本海外殖民地的日本国民返回日本本土的行为在日语中用「引き揚げる」这一动词表示。本文参照国内“返迁文学”研究者柴红梅的译法,将「引き揚げる」译为“返迁”。笔者认为“返迁”一词较为客观地表达出了帝国时期日本殖民者“迁往”海外殖民地,战败后又“返回”日本本土的完整过程与路径。返迁体验因区域的差异、殖民体制的差异以及殖民者的阶层差异、代际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呈多种排列组合的返迁体验与多元的返迁文学创作。既有的前期研究,从历史学、文学的角度对某一区域、某一时段的返迁问题或某一位返迁作家的文学作品做出了阐释,但尚缺乏对此类议题内在复杂性的重视,导致了部分现有研究的缺失。

事实上,返迁体验不仅是战后文学的题材,更是深深地嵌入在战后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中的活性资源。在战后日本,社会

各阶层纷纷介入讨论,为今人留下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1971年8月综合性杂志《潮》策划组织的“日本人的侵略与返迁体验”特辑便是一次充满痛感、具有高浓度思想内涵的讨论。将返迁文学置于战后日本知识界、思想界的总体场域中去思考,打通文学界与思想界的壁垒,才得以将返迁体验激活,得出的结论才具有推动现实、解决当下困境、作用于社会与人类的普遍意义。同时,作为立此存照的历史证言,特辑中的《返迁者百人告白》(以下简称《百人告白》)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体验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但受时空变迁、国际关系、言说语境和个人利益诉求诸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其在原理层面往往是有漏洞的、前后不一的,值得认真辨析。

### 1 失忆的哀史： 悲情叙事下加害经验的隐遁

“日本人的侵略与返迁体验”特辑是日本学术界、思想界关于战后日本普通民众返迁归国问题的一次集中性讨论,其中收录了日本思想家竹内

好与鹤见俊辅的对谈,评论家森本哲郎、立花隆、作家五味川纯平的评论,电影导演大岛渚对日本长野县西筑摩郡读书村原“开拓民”的采访,以及在《百人告白》中呈现出的普通民众的声音。其中《百人告白》搜集了日本战败后从当时的“满洲”以及中国其他地区、乃至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返迁者的回忆与证言。这百人的身份构成也极具多样性,其中有当时的“作家”“演员”“开拓民”“青少年义勇军队员”“大陆新娘”“满洲政府公务员”“满洲建国大学教授”等等,还有出生于“满洲”、当时尚处幼年期、少年期的孩子即“满洲”移民第二代。交错的视角与多维度的考察使返迁体验与返迁者的内心世界较为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百人告白》中的首篇,是生活在“满洲”的芦田伸介在日本战败后,举家返国的艰难经历与复杂心境:

跋涉几百公里的逃亡,在战败后的“满洲”一点也不稀奇。自安东至奉天,我们三百公里的逃难之旅,也许还算是幸运的。(中略)用皮筋把辛苦攒下来的钱,每十张一百元缠成一个卷儿,再用草绳将它们绑在两个脚踝上。火车发车不到十分钟,车厢里就发生了抢劫。缝在腰带、衣领里的钱最先被抢走,我暂且逃过了一劫。途中,铁路桥被炸掉了,我们只好下车,徒步艰难地翻越险峻的千山山脉、福金岭。(中略)每一天都是在穿越荒野、跌下陡坡、攀爬断崖中度过,稍作休息,就再不想起身了。但每当看到趴在妻子背上、刚出生半年的亚子的笑容,我就又鼓起勇气站在了队伍的最前头。每日如此反复。一天,在一间勉强得以落脚、苦力住的小房屋里,我们遭遇了暴民(指战时、战后初期袭击或抵抗日本殖民者的中国东北民众和抗日游击队员——笔者注)的掠夺。我用力把亚子搂在怀中,替她抵挡严寒。密生的灌木丛对面,一颗硕大的星星仿佛要掉落下来一般在夜空中闪着光。如果可以的话,我多想抱着妻女逃到那颗星星上去啊。<sup>11</sup>

以日本战败投降为转折点,生活在原日本海外殖民地的日本人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发生

了翻转,日本人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夜之间沦为难民。不同殖民地的历史背景、生活条件导致了殖民者战后的不同命运与结局。科幻小说家海野十三曾在1945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说满洲、桦太、朝鲜北部陷入了极端的混乱与暴力之中。”<sup>12</sup>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政治、军事环境异常复杂,故相较于其他殖民地,日本人在战败后暴露在“外地”(指原日本海外殖民地——笔者注)环境中的时间更长,有的数月,有的长达数年。笔者在对百名返迁者的回忆进行梳理时,发现其中充斥着强烈且单方面的受害情绪,尤以“满洲”返迁者为甚。《百人告白》的第二篇由返迁作家藤原贞所写,藤原回到日本后创作了返迁纪实小说《流浪的星星还活着》(1949)。这部曾深深感动了日本社会大众的战后初期畅销小说叙述了藤原本人带着3个孩子从长春出发,穿越北纬三十八度线,历尽一年艰辛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日本长野县的真实经历。在《百人告白》中,藤原这样描述自己回忆起返迁时的心境:

每年一到夏天,就陆续有人拜托我关于返迁写点什么。“不想再提了”,虽然我回到日本已经二十五年了,但每当提笔写那段经历,便会想起过去的种种痛苦,连回忆都是需要勇气的。在回想起那段岁月的日子里,我整夜都会梦到被人追赶,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直到气胸憋闷挣扎着睁开双眼才得以从梦魇中解脱出来。“原来是场梦,太好了”,虽松了口气,但满身虚汗的我再次体会到了那种似曾相识、似陷入地狱最深处般的感觉,几乎每夜都是如此疲惫。在梦中,我一定是背着刚出生的女儿,两手牵着五岁和两岁的儿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行囊。

“振作! 要努力活下去!”在梦中我对孩子们这样嘶吼着。  
(『潮』編集社,1971(8):113)

对于藤原来说,25年前强烈的精神创伤迫使她抑制自己去回忆那段流浪的日子,亦或说是为了活下去,她必须努力忘记。但每当不得不“想起”时,便会陷入黑夜逃亡在“满洲”旷野、漆黑中唯与星星做伴时的孤独与无助。此外,在《百人

告白》中还有诸如作家榎本拾三，“每当想起返迁时就像做了一场噩梦，无法从心中消散”（『潮』編集社，1971（8）：116）；原“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队”队员山口节雄，“‘北满’的开拓民是日本战败时最惨的悲剧主人公”（『潮』編集社，1971（8）：121）；原站马开拓民须永贞三郎，“我们用血泪和汗水建造起来的站马村，在一瞬间就不是我们的了”（『潮』編集社，1971（8）：125）等等哀情表述，不一而足。在“满洲”返迁者中，经历最为惨烈的是生活在“北满”的“开拓民”。他们被关东军抛弃在遥远偏僻的“满洲”腹地成为弃民，且对战事进展毫不知情。返迁路上他们以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流浪在中国东北大地上，因此从“北满”返迁回日的“开拓民”形象也成为战后日本社会对返迁者的典型认知。以“人间地狱”“噩梦”“逃亡”“望乡”等词语为关键词与主题的《百人告白》可以说正是日本知识界自战败以来，以日本人的返迁经历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的延续。诸如安部公房的《道路尽头的路标》《野兽们奔向故乡》、藤原贞的《流浪的星星还活着》《昭和战争文学全集·第十二卷·流离的日子》《满洲返迁哀史》《记录日本人·第5（弃民）》《海外日本人返迁记——情真意切慕祖国》《终战35年特集·手记·我的八月十五日》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回忆录、摄影作品，概莫能外。

面对战后泛滥的“满洲”返迁受害叙事，在竹内好与鹤见俊辅的对谈《真正的受害者是谁》中，二人一开始就谈到在十年前就读过很多返迁者的资料，从那时起就在想该如何把这些分散的、不完整的个人经历进行整理和保存，“只要是关于‘满洲’开拓民的记录，就全是凄惨的，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想法，似乎从中得不出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也并无指导未来的可能性”。<sup>[9]</sup>竹内的话呈现出其在战后开始思考返迁哀史叙事时的思想困境。国家暴力下的个人抉择涉及到人性最为晦暗幽微、难以捉摸的部分（如道德与情感等），因此试图从中寻求某种法则的尝试本身或许便是虚妄的。然而，讨论极端历史语境下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个人的选择伦理，并从中探求历史教训、以利将来的思想操练本身是必要的。

## 2 因果互生与咎由自取： 对抗 哀史 的路径与可能

长野县读书村自兴会编辑发行的《北满的哀歌》（1950）中记载了日本战败后“满洲”读书村中日本人当时的惨状。为拍摄以“满洲”返迁者战后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仪式》，日本导演大岛渚在长野县南木曾町，对战后返迁回日的读书村民进行了采访，这次采访为返迁哀史叙事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从大岛渚（1971.8）的采访记录可以看出，当事人大多对为何遭遇屠杀闭口不谈，或将屠杀说成是一次普通的抢劫；在南木曾町，为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而建立起的所谓“和平之基石”的“拓魂碑”上，也只写着是因饥饿与疾病导致了该村“牺牲者”众多，对被屠杀一事只字未提。幸存的“开拓民”掩盖事实的背后深意颇值得思考，诸如“许多人死了，惟有自己活下来”这一由雅斯贝尔斯（1998）所提出的、生者对死者形而上的“罪责感”固然是不愿提及往事的原因之一。但大岛在《和平的桥梁——长野县开拓团的记录与祈愿》中就读书村民为何被屠杀寻找到了原因：“（读书村民）在开拓地进行经济统制、强制征收土地，招致了当地人的怨恨；抓捕劳工、强制征用更是惹怒了当地人。”<sup>[10]</sup>由此不难推测出，正是因为“开拓民”当时的恶劣行径，才为其之后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事实上，日本人到达“满洲”之后强占当地人的房屋、强行征收农民土地之事常有发生，在陈正谟所著《日本铁蹄下之东北农民》一书中便有这样的记载：

日本占据东北以后就派人调查沿河一带的村庄，田亩，农民户数，房屋及农具件数造成清册。随后日本按照清册，计算可以来的农民户数，对于原住的农人每户给以些许的搬家费，强迫他们各自走开，让日本移来的农人居住耕种。我们的农人赤手空拳，无法抵抗，只得扶老携幼，各自哭哭啼啼地离开，走向别处谋生。<sup>[11]</sup>

日本关东军以低廉的价格强行收买当地的熟地也已司空见惯，如在叶忠辉、张耀民（1986）中有

这样的记载,1934年1月,关东军开始大规模强制收购依兰、桦川、勃利等6县的可耕地,收购的价格是不论熟荒一律每垧一元钱。而在当时,依兰县的熟地价格应在每垧58.4—121.4元、荒地价格应在每垧41.4—60.7元这一范围内。由此可见,此种象征性的“有偿收购”与强取豪夺并无二致。与此同时,“开拓民”的到来使“满人”成为了日本人的奴隶。王升远(2017)就曾提及,日本浪漫派作家保田与重郎在游历“满洲”后所创作的长篇作品《蒙疆》中写到,在“满洲”生活的孩子偶尔回到日本时,看到自己的长辈在田间工作,会感到令人耻辱。孩童真实的心理如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折射出了在“满洲”的日本人与“满人”之间冰冷的压迫与被压迫、日本人高“满人”一等的社会级差结构。

侵略与抗争是一对因果关系,在其影响之下,流离失所的中国农民很多就此组织或加入了抗日游击队,抵抗日本“开拓团”入侵,争取民族独立。而当驱逐原住民、征收土地遇到阻力时,驻当地负责保护日本移民安全的关东军就会出面扫平障碍,也因此制造了诸多惨案,导致无辜的平民死伤无数。掩盖事实就是试图掩盖自身的侵略行为,置言之,强调受害体验即是有意遮蔽加害行为。若站在因果互生的角度去思考,不难发现《百人告白》等诸多顾影自怜的作品大多只强调了战败后日本人在殖民地及返迁途中受到的苦难,而鲜有提及日本人在中国的资源掠夺与对当地农民的榨取。几乎所有人都缺失一种认识,即这段哀史的产生与日本的侵略加害行径有着直接关系。在他们“闯入满洲”之后,原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主人遭受了怎样的命运、他们曾经的“有所获得”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等问题很少被提及与反省。

战败时年仅5岁的日本评论家立花隆也经历了返迁,但他提供了一种不同视角的返迁体验。立花隆1940年生于长崎、从1942年直至日本战败一直生活在北京。虽当时年纪尚幼,但环境的骤变仍对他的人格形成造成了影响,又因成长于返迁家庭,因此立花对于返迁体验并不陌生。立花在《红色的尸体与黑色的尸体》一文中,对此类意

在博取民众同情的悲情叙事进行了强烈抨击,并将此类作家称为“返迁哀史作家”:

日本的返迁哀史作家似乎怎么都不会理解,他们在体验记中,越是沉浸在悲剧爱好趣味中,就越显得做作,就越会有人觉得他们是咎由自取,但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中略)一些健谈的日本人都在高谈他们作为受害者的战争体验,俨然是悲剧的主人公。仿佛除了一些被拉来做替罪羊的战犯之外,就没有其他加害者了。我们作为战后的一代,想从战争体验者那里听到的,不是他们在战争中怎样受害,而是怎样加害、怎样做了殖民地丑恶的统治者。如果不说清楚的话,我们逃不过未来的又一次返迁。<sup>[6]</sup>

在这段话中,不无愤怒的立花将哭诉哀史的“他们”与并不想听哀史的“我们”区分开来,试图拉开距离客观地审视批判。“他们”是战后从“外地”回到日本、哭诉自己不幸的日本人,“我们”是如立花这般,返迁时处于年幼期或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战后一代。“我们”想要听到的是“他们”为何当初要踏入其他民族的国土以及如何殖民地做了统治者,并不想听到的是“他们”的受害体验。立花所说的“咎由自取”意在提醒日本民众不要被同胞的悲惨所迷惑,若只同情于表面的伤痕,则会迷失于事情的本质。而战后返迁受害叙事的泛滥正是由于返迁者不谈加害之“因”,只谈受害之“果”所致。立花(1971(8))甚至认为,战后返迁团体向国家索求赔偿金,以补偿其在回国时“被迫”放弃的海外资产这一行为都是肮脏的。作为返迁第二代的立花冷静客观地、以亲历者的身份站在因果关系的延长线上抨击了“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并试图去说服民众莫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对于《百人告白》中所呈现出的受害情绪同样持批判态度的还有作家五味川纯平。凭借长篇小说《人之条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作家、之后又创作了18卷全景战争巨著《战争与人》的五味川本人就是返迁者。他在《原点:我的“战争与人”》一

文中,对于日本人的“加害”,有过这样一些回忆:

“随着殖民政策的推进,在中国的日本人数量急剧增加,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傲慢也越发明显起来。日本人出门是叫人力车的。‘满人’车夫流着大汗跑了一段远路。日本人应付三十文钱作为报酬,却只给了十文钱。车夫对此不满并抗议,日本人却骂道:‘中国佬不要提普通人的要求’。随后日本人打了‘满人’车夫,扬长而去。”<sup>[7]</sup>

“我毕业后就在鞍山的昭和制钢所工作了。因为是中专毕业,直接就做了职员。在我之下,还有中学毕业的准职员和二十岁上下、被叫做雇员的职工。还有作为底层劳动者的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如果说在这样的榨取机构中,从事最底层生产劳动的才配得上“劳动者”这一称谓的话,那么在那里(鞍山的昭和制钢所)没有一个日本人称得上是‘劳动者’。日本人都是小混混模样,却作为‘劳动贵族’把几个中国人踩在脚下。” (五味川純平,1971(8):193)

作为返迁第二代,五味川从小背负着痛苦的“原罪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成长与记忆之中。五味川以亲历者的身份指出,“这(受害叙事泛滥)相当于在和日本人过去的行为相互抵消,是非常危险的”(五味川純平,1971(8):192)。加害与受害的二元对立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存在,若能轻易将战败导致的受害体验与自身的加害行为相互抵消的话,那将意味着历史根本不曾发生过,因此是不能、也无法简单抵消的。据大岛渚的采访与调查可知,读书村的“开拓民”并没有自己建造房屋,而是通过武力将中国人驱离家园,直接霸占房屋,将原住民集中安置在一个名叫“与成屯”的村落,并抢走了包括熟地、水利设施在内的诸多资源。一位接受了大岛采访的原“开拓民”曾说:“每当我路过与成屯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恐惧”(大岛渚,1971(8):198)。这样的“恐惧”与“悲剧”,正如学者孙歌指出的:“对于战后日本的社会记忆而言,是一种不能面对受害国直接表述为‘被

害记忆’的被害记忆。”<sup>[8]</sup>对于受害群体来说,日本移民仅仅意味着加害的历史,而对于日本移民来说,他们在那场日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集体人口迁移中,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关于普通民众的返迁受害记忆,在藤原贞主持的一次主题为“努力活下去的女性之记录”的座谈会中,四位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返回的女性各自回顾了返迁过程中的苦难经历,她们将返迁体验升华为是在极端语境下人之执着与生命力的见证,并都表示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力”与“感恩之心”。藤原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若几十万、几百万和我同样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并且低调地去生活的话,我相信愚蠢的战争不会再重复出现。”<sup>[9]</sup>藤原将这种“相信”称之为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新的力量”并给予了褒扬,而对于为何会有那段痛苦的经历则没有提及。藤原在《将体验讲给后人听的义务》中写道:“把那些体验说出来并留给后人,愿它能成为通往和平道路上的标志,希望不要再出现像我这样的可怜人”。(藤原てい,1970:81)藤原自诩为“可怜人”,她虽意识到返迁者鼓起勇气地自揭伤疤是活下来的人对后人的一种义务,但她回避了自己也是侵略战争协力者的事实,她的“反战”只是停留在“战争是愚蠢的,不要战争,需要和平”的“受害者”心态层面。

从六十年代起,由于战中派一代开始逐步主动遮蔽屈辱的伤痛代替了难以言表的战争体验,返迁相关战争记忆逐渐风化。这一时期日本文坛涌现出大量美化战争、赞扬“勇敢”“纯粹”之战争精神的文章,同时,亦产生出了大量描述战争惨状的“战争体验记”,出现了把“悲剧”“痛苦”等情绪化表达的倾向。返迁受害叙事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泛滥之势,藤原贞就是立花隆所批判的、通过情感的泛滥来博取他人同情、从而遮蔽自身责任的返迁哀史作家之一。以藤原为代表的返迁作家的朴素反战思想与过度的“顾影自怜”导致了这一群体所传达出的受害叙事模糊了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而也将返迁者的加害行为抹杀了,这是将个人体验做“去政治”化处理的必然结果。当然,基

于切身的受害体验而形成的朴素的反战、厌战观念具有合理性,因毕竟并非所有受害者都会将切身的受害体验普遍化从而发展出反战精神;但若仅仅满足停留于此,甚至“有意”将其化为一种“回忆”的话,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是危险的、值得警惕的。这一体验留给日本民众的不应只是身体与心理层面上的“残酷”,因为“残酷”不等同作为加害者的个体反省,对战争责任的真正反省也不应该从作为受害者的身份意识开始,而应是从加害者的身份开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仅有情感和体验以及建基其上的朴素主张、愿望是不足的;唯有对“返迁体验”背后的政治力学关系做出深入的、形而上的追溯与检视,才能在形而下的层面避免悲剧重演。而将返迁体验的“前因后果”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则有赖于思想家的登场和参与。

### 3 共情与 不杀人的思想:

#### 返迁体验的思想化及其史鉴意义

在战争已结束了25年的上世纪70年代初,跃居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渴望以独立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开展自主外交,而与亚洲邻国重新建立起正常邦交则意味着历史问题将会上升为国家之间的现实政治问题。日本应如何面对战争遗留问题、如何与亚洲邻国和解,如何思考战后返迁似乎是无法回避的,也只有对返迁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与反省,才能避免害人终害己的历史再次重演。如果说背负着“殖民者二代”之沉重“罪名”的立花隆与五味川纯平以观察者的视角冷静地指出了日本殖民者因战败遭遇的受害体验并不能简单地与曾经作为殖民者的加害行径相互抵消,那么鹤见俊辅与竹内好针对《百人告白》所进行的对谈《真正的受害者是谁》则试图去激活看似千篇一律且毫无生气的返迁哀史,提出了如何才能赋予660万返迁者的经验以生产性;能否将散在的个体经验普遍化、原理化、思想化,而非单纯做情感化处理;能否从中提取出经验并适用于将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日本思想家通过战后长时段的困惑与思考之后提出

的。在对谈中,鹤见指出:“若把直接的体验就那样放入冷冻室的话,也许能够保持新鲜。但如果就那样放着的话,是无法成为一种推动现状的、活着的思想的”(鹤见俊辅、竹内好,1971(8):96)。而这次的二人对谈便是将返迁体验“解冻”,并将其重新置回历史脉络当中,将因果贯通起来去思考殖民亚洲的历史究竟为日本带来了怎样的教训。对此,鹤见进一步指出:“为了使返迁体验成为一种有效的历史经验,就一定要将自己与自己的情感切割、分离,要对自己的情感进行批判。不能认为打自己的人(对日本人进行袭击报复的满人)全都是可恶的,这是没有进行立体的思考”(鹤见俊辅、竹内好,1971(8):99)。当情绪代替了原理,思考便难以聚集于具体的问题,所以原理化与方法化的基本前提是“去悲情”,即将思想与情感区分开来,去掉“多余”的自我关注,与对方共情。在对谈中,鹤见反复强调“相对立点”(日文为:对蹠地点)在思考返迁问题时的必要性。鹤见提出的“相对立点”即跳出受害者意识,站在“受害”的相对一方——“加害”的位置,通过思考自己的伤痛,去真正理解当时被自己劣等化对待的对方。

鹤见赞扬从朝鲜返迁归国的作家五木宽之,他认为五木的创作并非封闭于个人的体验,在五木的视野中是有“相对立点”的。在其战后创作的《再见吧,莫斯科愚连队》《看,那灰色的马》等多部作品中均表现出了他基于自身殖民地生活体验和返迁体验而生发出的反战思想。与强调日本人是战争受害者的众多战后日本作家不同,返迁二代作家五木摆脱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情感,在作品中揭露了日本人的加害行径及其对亚洲其他民族的伤害。对此,鹤见认为:“这是用一种有趣的方法将父辈时代的经验进行重构,也是一种战争体验的传承”(鹤见俊辅、竹内好,1971(8):96)。五木的创作与鹤见的解读提示,返迁体验及返迁题材的文学创作,因代际差异会呈现不同的图景和问题意识。败者归来的耻辱感与强烈的创伤记忆导致了返迁一代对返迁体验的或避而不谈或美化,而当亲历者刻意隐瞒或很难去坦白自己的罪责时,自身是无法对过去进行允执厥中的审视和

公正的审判,因为自我难以对自我进行相对化处理,此时“他者”视角的介入就显得尤为必要。鹤见也因此认为,相对而言,创伤体验与情感障碍相对较弱的返迁二代是颇可寄望的。

鹤见虽认为,返迁一代的体验“无用”,但在笔者看来,若没有第一代的痛感,在其基础上二代的再创造也无法得以实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返迁一代的悲情叙事作为一种直观的、基础性的鲜活战争体验,虽难言理性,却是后来触摸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来源。在记忆与真实、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中,只有将返迁一代情感中的可靠部分,与二代历史中的理性部分有效结合,才能得出逼近历史真实的返迁体验,也才能够获得将返迁体验思想化处理的可靠路径。

在思考返迁问题时,除了与对方共情、承认自身的加害行为之外,鹤见与竹内还提出了为不再出现第二次返迁,便要从源头上抵制战争,即站在追求人类普世价值的高度反对暴力、维护世界和平。鹤见在对谈中赞扬了返迁作家木山捷平文学中的“不杀人”思想。木山捷平在其纪实性小说《长春五马路》中有这样的情节描写:

被误认为是满人,正介反倒感觉自豪。在五马路成百上千个卖旧衣服的人中,正介是唯一的日本人。尽管如此,在满人中没有人视他为“异类”。虽是平米见方的摊位,但没有人抢地盘、争利益,说些人种不同这样挑剔的话。如王侯一般坐在五马路上、被当做满人,对正介来说更是一种光荣。<sup>[10]</sup>

因日本战败导致了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原有的阶级分化分崩离析,小说主人公日本人木川正介却“如王侯一般”坐在长春的五马路上,使用“黑市的语言”与中国人一同卖旧衣服,并“享受”着在异国的生活。正介在异常的战败空间中,与中国底层的百姓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从当地人那里学到了做生意的技巧,甚至以自己被误认为是当地人而感到自豪,这与《流浪的星星还活着》等返迁纪实文学中单纯描写返迁者在战争极端语境下拼命“求生”的情节有所不同,木山总是能以幽默达观

的姿态表述战争“异常”中凡俗生活的“日常”,这是木山文学的特质。而作品中主人公正介的心态与行为也提示我们,当个人与国家之间紧密的连带关系因战败而不复存在,脱离了隶属于某国的“国民”身份、还原到凡俗“个人”的体验,个体便会从个人与国家的分离中获得暂时性的解放感。而使用“黑市的语言”与周围人进行买卖交易的正介也得以从“战胜”与“战败”“加害”与“受害”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在这种解脱感中找到了自己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既非战败者亦非战胜者的超脱之感。而正是这种解放感、超脱感以及朴素的人类之爱才得以成为人们反抗战争、追寻和平的可能与动力。

《长春五马路》这具有一定虚构性质的自传本小说中,主人公正介在接受当地人宴请时自创并吟唱了一组短歌,其中的一句歌词为“饿死、冻死、我也不杀人”(木山捷平,1968:73)。也许这只是木山在小说内部的情节语境中设置的主人公自己不想被杀、面对中国人进行自我保护的一个合理的场面话,但鹤见将其作为高度评价木山捷平“不杀人”思想的论据,这恐怕也有待推敲。“不杀人”的思想实际上是鹤见自己的思想,因长期在美国求学与生活,“平等、自由、博爱”等民主精神被深植于鹤见的思想当中,鹤见将木山拉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可以说是“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尝试。从木山个人的写作经历来看,在其1960年代创作的《大陆小道》和《长春五马路》中,木山对军国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我不杀人”的情节设置也表达了其在个人层面上反对暴力、不伤害他人、向往和平生活的单纯选择;并且在战后,从不讨论“人”的问题到开始讨论“人”的问题,木山较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已属难得。但实际上,这两部作品仍旧延续了战后日本文坛中战争体验文学的基调,并未见有承认并深刻反省日本人的侵略与加害行为的表述,可以说仍缺乏正视历史之态度。

管见所及,在返迁体验以及以返迁体验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很少自发地生长出内含着反省自身加害行为的“不杀人”思想。鹤见将战后日本文坛上非主流作家木山捷平在小说中设置的一个情节

拉入到自己的论述脉络里,也从另一层面折射出鹤见所提倡的“不杀人”思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言论界的稀缺,主流作家对于法西斯主义暴力对他国人造成的创伤几乎是集体失语。“不杀人”的思想在留学美国后又到了东南亚战场的鹤见身上可以追溯到源流,而在行走于日本帝国与“满洲”帝国这一封闭循环系统中的返迁者身上则很难生长出来。战后,由美苏英三国共同制定的《波茨坦公告》意将日本改造成为一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尊重人权的国家,“不杀人”思想是《波茨坦公告》中的核心问题,亦是日本战后思想中的重要议题,但却长期淹没在了战后“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的声波中,未能内化为一种精神品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国际局势虽仍处于冷战背景之下,但已出现了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萌芽,是继续追随美国还是自主外交,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日本战后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思考环境。这一时期是日本改变一味依附美国“怀抱”的外交战略、走向独立自主之路的绝佳机会。此时,中苏对立逐渐升级,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进入尾声,在国家共同利益驱动下中美关系得到缓和并刺激了日本与中国的接近。以竹内好为首的、积极推动中日复交的知识分子借此时机在日本论坛掀起了一场以“道义复交论”<sup>[1]</sup>为基调的舆论浪潮,期望通过这场大讨论让民众层面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伤痛与损失,以唤起日本国民的自省意识,并据此使其产生对中国人民的赎罪意识,旨在以朴素的民间情感导向推动中日复交的现实实现。这一时期,《潮》《中央公论》《世界》等杂志都刊登了

不少讨论日本对华负有加害责任与道义责任的文章,“日本人的侵略与返迁体验”特辑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主动承认自身的加害行为、向中国谢罪并与中国复交,从而改变日本“唯美是瞻”的外交政策与政治地位的期待,这应是竹内好加入到此次对谈中的动机所在。

#### 4 结 语

“日本人的侵略与返迁体验”特辑是日本学术界、思想界关于战后日本民众返迁归国问题的一次集中性讨论,其中收录了竹内好、鹤见俊辅、五味川纯平、立花隆等战后日本思想精英的相关讨论,以及在《百人告白》中呈现出的民众声音。在战后日本,围绕返迁的哀史叙事在返迁者自身及其家族成员撰写的文字中俯拾皆是。以藤原贞为首的返迁作家因经历过战时悲惨的生活而对战争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并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保持警惕,这一点值得肯定,但若仅仅停留于由受害意识支撑起来的反战观念则无法激发出更为深刻的反省,也大大增加了重蹈悲剧的风险。如何从战争体验走向战争经验,如何不再出现第二次“返迁”,参与本次讨论的战后思想家为使战争体验具有一种史鉴意义,将“返迁问题”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鹤见俊辅所提出的“不杀人”思想实则触及到了日本“近代的自我”之确立、战后日本主体性丧失与民主化改革不彻底等问题。

[本文为2018年度“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战后日本“满洲”返迁体验的文学表象及其思想史位相)”(项目批号:2018SK0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蔺静]

#### 注

[1] 『潮』編集社.引揚げ者100人の告白[J].潮,1971(8):112.

[2] 海野十三著,橋本哲男編.海野十三敗戦日記[M].東京:講談社,1971:143.

[3] 竹内好,鶴見俊輔.本当の被害者は誰なのか[J].潮,1971(8):101.

[4] 信濃毎日新聞社編集局編.平和のかけはし:長野県開拓団の記録と願い[M].長野県:信濃毎日新聞社,1968:37.

[5] 陈正谟.日本铁蹄下之东北农民[M].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1938:142.

[6] 立花隆.赤い屍体と黒い屍体[J].潮,1971(8):222.

[7] 五味川純平.原点としてのわが“戦争と人間”[J].潮,1971(8):192.



- [8] 孙歌.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82.
- [9] 藤原てい「この体験を言い残す義務」[C]//毎日新聞社編.在外邦人引揚の記録:この祖国への切なる慕情.東京:毎日新聞社,1970:81.
- [10] 木山捷平.長春五馬路[M].東京:筑摩書房,1968:73.
- [11]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上册[M].苑崇利,胡亮,杨清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63.

#### 参考文献

- 王升远.史述评鹭、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满蒙鲜支”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17(1).
- 叶忠辉、张耀民著《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C]//李立新、温野等.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十一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M].邱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カール・ヤスパース著,橋本文夫訳.戦争の罪を問う[M].東京:平凡社,1998.
- 大島渚.消えた長野県「読書村」[J].潮,1971(8).
- 立花隆.«戦争」を語る[M].東京:文藝春秋,2016.
- 鈴木常雄執筆,読書村自興会編集.北満の哀歌[M].長野県:読書公民館,1950.
- 藤原てい.流れる星は生きている[M].東京:日比谷出版社,1949.
- 鶴見俊輔,上坂冬子.対論:異色昭和史[M].東京:PHP研究所,2009.
- 植民地文化学会、中国東北淪陥14年史総編室編.日中共同研究『満州国』とは何だったのか[M].東京:小学館,2008.

作者简介: 蔺静(1983—) 女 汉族 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日本文化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61541629@qq.com

## Sense and Sensibility Intertwined in "The Invasion and Repatriation Experienc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bstract:** In August 1971, *Ushio*, a Japanese magazin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published a special issue titled "The Invasion and Repatriation Experienc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s an extensive discussion by Japanese scholars and thinkers on issues relating to the repatriation of ordinary Japanese people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is issue included contributions from Yoshimi Takeuchi, Shunsuke Tsurumi and other major figures in Japan's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the views of Japan's general public were also reflected in Monologues of One Hundred Repatriates. 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Monologues of One Hundred Repatriat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prevailing presence of a strong, nonreciprocal emotion of victimization. This predominant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victimization spread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on repatri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By scrutinizing the creative thinking of Japanese thinkers on how to reach a rationaliz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alled "desolate history" and learn from it with a sensible mind - a perception that creates a tension with Japan's general public unduly consumed with irrational emotions towards this part of history, this paper strives to expos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repatriation experience, such as a mismatched conceptualization of viewing Japanese repatriates as victims instead of perpetrators, and flaws impeding modern progress in East Asia.

**Keywords:** war; repatriation; desolate history; perpetration; victimization

#### Author's Information:

Lin Ji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3

Ph.D. candidate a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Culture

E-mail: 61541629@qq.com